

doi: 10.7621/cjarrp.1005-9121.20200315

· 研究报告 ·

“城居保”对中国农村家庭消费支出 异质性实证研究*

奥百宁¹, 张帆²*

(1. 西安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710032;

2. 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目的] 全面分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现状的影响, 就进一步完善该项政策和稳定农村消费市场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方法] 文章以消费和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为分析框架, 通过选取合理的样本面板数据, 运用系统 GMM 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结果] 财产性收入是影响农民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因素以及投保档次的制约因素, 作以存量财富为基础的财产性收入要比流量形式存在的财富具有更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即财产性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加农村家庭对养老保险的依赖程度。另外,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消费能力表现出异质性影响。其中,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食品性等日常性支出、文体消费支出水平明显要高于对医疗消费支出水平。[结论] 国家要加大宣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积极和辐射作用, 让广大农村家庭能够真正了解这项政策的意图。同时, 要逐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性障碍, 让更多农村家庭能够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养老待遇。

关键词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消费支出 农村家庭 财产性收入 系统-GMM

中图分类号: R1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121[2020]03121-09

0 引言

我国1992年下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但经过10余年的发展, 这项制度存在的问题逐步凸显, 并成为制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 我国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扩大了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特别是在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全国覆盖后, 2009年9月, 我国启动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 并在2010年10月1日开始全面实施, 2014年在总结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中央将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合并实施,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居保”)制度。截止2017年底, 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达9.15亿人^①, 基本覆盖了全国所有县市, 是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养老保险国家。这项涉及全国的惠民工程, 中央提供了充足的财力来提升农村居民的参保率。同时, 中央还制定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 进一步保障了失地农民的基本利益(朱岩, 2013^[1])。那么中央在制定实施的“城居保”政策, 这项涉及到农村广大群众的系统性工程如何影响农村家庭各项消费支出水平, 进一步完善“城居保”政策和稳定农村消费市场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城居保”政策的实施不仅是为了应对我国农村养老问题, 还承载着打开农村市场、扩大内需、促进

收稿日期: 2018-06-06

作者简介: 奥百宁(1975—), 女, 陕西蒲城人, 讲师, 研究方向: 金融方向

*通讯作者: 张帆(1981—), 男, 浙江杭州人, 副教授。研究方向: 财税理论与社会保障。Email: zf1219100@163.com

*资助项目: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分税制财政体制垂直不平衡对地方债务融资的机制影响研究”(LY18G03003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与融资饥渴矛盾的财政平衡机制研究”(19BJY225)

①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http://www.mohrss.gov.cn>

宏观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任务。从微观角度来看,未来必将对中国农村市场消费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城居保”改变了农村家庭的预算约束集。由于参保需要农村居民要缴纳一部分保费,而在农村家庭收入结构中,购买养老保险作为晚年的生活保障,只有参加了这项保险才能在晚年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那么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程令国等^[2]认为农村家庭预算行为将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农村家庭的参保意愿,进而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模式,长远来看还将对农村经济结构和农村市场经济行为等方面产生影响。其次,从国际经验来看,社会财富在不断积累过程中,政府越来越重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开展了覆盖低收入群体的养老金计划,以提高底层群体的“富裕感”和“幸福感”,比如 Juarez^[3]和 Fan^[4]等提出墨西哥的“老年营养计划”和南非的“老年养老金计划”等。

1 研究假说提出

保险作为一种风险防范和应对机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机制影响居民的储蓄、消费和投资等决策。从理论角度而言,养老保险对储蓄的影响,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生命周期理论,其核心内容反映了居民个体基于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的信息来实现消费的最优配置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即年轻时候储蓄,在老年时候选择消费。在中国,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家庭均具有十分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就养老保险本身而言,宋建辉等^[5]不仅可以保障老年时期的收入和消费,而且还可以进一步释放当期消费需求。从更深层次来讲,养老保险与储蓄、消费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考虑信贷约束和不确定性因素。在不考虑这两种因素的情况下,当期的消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养老保险的影响,则取决于养老保险和私人储蓄两者收益的权衡。如果考虑借贷约束和不确定性因素,养老保险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在分析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影响时,需要进一步考虑所处的制度环境和不同群体的差异,不同的环境和群体会直接影响或者受到借贷约束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

文章研究的起点是分析“城居保”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及其结构的影响。中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从2010年开始在全国试点,并在2012年底实现全国所有县(市、区)的覆盖,其参保对象为未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且年满16周岁的农村居民,采取自愿参保原则。参保人领取的养老金来自于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两个部分,个人账户资金来源于个体缴费、政府补贴和集体补助3个部分。相比较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起步晚、标准低、覆盖面广,虽然面临诸多因素和障碍,但其中一个直接影响参保的是农村家庭的收入状况和收入结构问题。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可以从存量财富和流量财富角度来理解这一问题,即农村家庭财富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户是否参保以及参保的档次。其中,李晓华等^[6]认为家庭的存量财富又是影响农户参保的主要因素,因为只有存量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从长远角度考虑家庭财富支出方式和分配方式,而“城居保”作为家庭中一项先支出后受益的财富分配方式,在初期对于参保家庭而言必然会涉及到是否参保以及参保的档次问题。也就是说,存量财富多的家庭有能力分配出一部分财富用于参保和提升参保档次,从而在老年时期能够获得稳定的养老财富。但对于存量财富较少或者没有的农村家庭来说,所获得的流量财富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生活等开支,并不利于这类家庭参保的积极性,即使参保也只会选择较低档次的保额。

另外,从农村居民年龄结构上讲,可分为60岁以下需要参保和60岁以上无需参保的两类群体。对于前者,处于缴费阶段,其参保意味着退休后可获得一笔稳定的收入,退休后的收入风险随之降低,王旭光^[7]认为可以通过财富提点效应和降低未来收入风险来弱化储蓄倾向,进而有助于增加当期消费;对于后者,60岁以上的群体本身就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生产属性几乎为零,参加“城居保”可以直接增加当期收入,因而通过降低其收入风险来弱化其储蓄动机,进而刺激消费。同时,从消费结构来看,贺立龙等^[8]发现“城居保”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受影响群体的消费偏好,对于60岁以下群体,本身属于劳动力市场中的财富创造者,本身的消费结构相对稳定,城居保所带来更多的是水平效应而非结构效应,即“城居保”可能会刺激消费水平,但不会改变其消费结构。对于60岁以上群体消费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大,退

休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主要开支将用于生活和食品消费、医疗消费以及文体等消费,另外,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制度实施时间较长,家庭医疗消费压力可以通过参加“新农合”而得到缓解,而并入“城居保”后,60岁以上群体会因收入的增加,张晔等人^[9]发现有利于改善在生活消费、食品性消费以及文体消费方面的支出水平和结构。

最后,还需要进一步从农村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正如上述分析所指出的,“城居保”对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老年人口的规模和比重,目前,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老龄化呈现出加速的趋势。特别是我国城镇化加速推进,人口城市化将直接加快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比如1982年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老龄化水平分别为5.00%和4.56%,前者仅比后者高出0.34个百分点。但自1990年开始,乡城迁移人口规模及其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开始逐年增大,到1999年农村地区较城市地区先行进入老龄化社会,岳爱等人^[4]发现老龄化水平较城市高出1.03个百分点。进入21世纪以来,城乡迁移人口规模进一步明显增大,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也相应更加显著。到2010年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率已达到10.06%,比城市地区高出2.26个百分点,王桂新等^[11]认为而且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提高。程建等^[12]认为伴随着农村老龄化趋势的加剧,通过覆盖“城居保”和标准的提升,有助于刺激消费反哺农村经济发展。

因此,根据上述基本分析,该文拟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 I:农村家庭所有收入来源中,存量财富较之于流量财富而言更易正向影响农村家庭投保的积极性和投保档次;

研究假说 II:“城居保”支出将对农村家庭整体消费能力的提升,特别是会增加日常生活消费支出水平的冲动。

2 数据与方法

2.1 计量模型设定

首先,基于上述逻辑分析和研究假设表明,农村居民是否参加“城居保”行为是一种经济理性的思辨过程,石绍斌等^[13]影响农村家庭参加“城居保”的因素很多,而家庭收入状况和收入结构往往是影响参保意愿和参保决策的重要因素。为此,该文把农村家庭中不同性质收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引入模型中。在选择该指标时,考虑到家庭持续性收入对农村家庭是否参与“城居保”存在滞后性影响,因此把该指标滞后3年的平均数作为解释变量。另外,由于“城居保”有不同档次,缴纳的档次越高,能够享受到的福利也越高,因此在选择养老保险的不同档次时,把该指标按照存量财富和流量财富收入分别进行反映,即农村家庭中财产性收入为存量财富,而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属于流量财富,这类财富主要用于即期消费或归还债务。建立基准模型为:

$$\ln(\text{insurance})_{it} = \beta_0 + \beta_1 \text{income}_{it-n} + \lambda_i + \mu_t + \xi_{it} \quad (1)$$

式(1)中, $\ln(\text{insurance})_{it}$ 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城居保”支出规模并取对数; income_{it-n} 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农村家庭滞后*n*年的平均收入,主要包括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这4类不同性质的收入; λ_i 表示地区固定效应; μ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ξ_{it} 为随机扰动项。

当然,除了这机制作用外,所有影响农村家庭持续性收入的内在和外在因素都会影响参加“城居保”意愿。为此,在式(2)中,还选择了滞后3年的平均收入来反映农村家庭持续性收入情况。除经济因素之外,模型中还选择老年人口抚养比(elderly_{it})、农村户籍人口性别比(sex_{it})、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investment_{it})和农业人口(agricultural_{it})等相关控制变量。因此,在模型(1)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下扩展模型为:

$$\ln(\text{insurance})_{it} = \beta_0 + \beta_1 \text{income}_{it-n} + \sum_j \beta_{ij} X_{ijt} + \lambda_i + \mu_t + \xi_{it} \quad (2)$$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城居保”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水平和结构的影响。为了能够区分“城居保”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水平和结构,主要选择生活消费支出、食品等日常性支出、文体消费和医疗消

费支出等4类指标进行反映。另外,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是破解“城乡二元”的一项重大改革,在体制上打通了“城乡二元”并存的制度障碍。为此,该文还选择了户籍制度这一虚拟变量加入模型中,并与“城居保”支出指标形成交互项来刻画农村家庭参保后对消费支出水平和结构的影响。户籍制度哑变量的取值为:2013年之前取值为0,2013年之后取值为1。为此建立如式(3):

$$spending_{it} = \beta_0 + \beta_1 \ln(insurance)_{it} \times T + \lambda_i + \mu_t + \xi_{it} \quad (3)$$

式(3)中, $spending_{it}$ 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主要包括农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consumer_{it}$)、食品等日常性支出($expenditure_{it}$)、文体消费支出($stylistic_{it}$)和医疗消费支出($medical_{it}$)等4类不同消费支出指标; $\ln(insurance)_{it}$ 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城居保”支出规模并取对数; T 是户籍制度的虚拟变量。

为了使得回归结果更稳健,模型中还加入了影响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的相关控制变量。比如农村家庭的存款余额($save_{it}$),取农村家庭的存款余额的对数进行反映,该指标越大,对家庭消费支出影响越大。人口结构($popstructure_{it}$)指标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有较大影响,该指标用15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人口占农村总人口比值,一般来说,该指标越大,非劳动力人口占比越大,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种负担。农村固定资产投资($investment_{it}$)越大,农村家庭用于消费支出自然减少。除处之外,还把农业人口($agricultural_{it}$)、幼儿入园情况($Kgarten_{it}$)、人口自然增长率($growth_{it}$)、农村居民教育程度($hschool_{it}$)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由此扩展到式(4)。

$$spending_{it} = \beta_0 + \beta_1 \ln(insurance)_{it} + \beta_2 \ln(insurance)_{it} \times T + \beta_3 spending_{it-1} + \sum_j \beta_{ij} X_{ijt} + \lambda_i + \mu_t + \xi_{it} \quad (4)$$

在上述模型(4)中还加入了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的滞后项作为控制变量。因为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上期消费支出对本期消费支出是有很大影响的,而且消费支出有刚性特点,随着上期消费支出不断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期的消费支出水平。

2.2 相关变量解释

2.2.1 核心变量

(1)“城居保”支出指标($\ln(insurance)_{it}$)。我国“城居保”是在原来养老保险的基础上由过去农民自己缴费转变到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模式,对“城居保”政策的不断宣传、实施和推进,增强了农村家庭参保、投保的积极性,对年满60周岁以上的农村家庭来说更是增加了实际可支配收入,但对其消费支出水平和支出结构有什么影响需要进一步检验。为此,用农村家庭所缴纳的保费(缴纳的保费是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总和)的对数作为“城居保”支出指标进行反映。

(2)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类指标($spending_{it}$)。农村家庭消费支出主要包括四大类:生活消费支出($consumer_{it}$)、食品等日常性消费支出($expenditure_{it}$)、文体消费支出($stylistic_{it}$)和医疗消费支出($medical_{it}$)。其中,生活消费支出主要是指农村家庭所有的生活性消费开支;食品等日常性消费支出主要是指食品、烟酒等生活中日常性开支;文体消费支出主要是指与文化、体育等相关的开支;医疗消费支出主要是指看病保健等与健康相关的开支。

(3)农村家庭持续性收入指标($income_{it-n}$)。农村家庭财富收入滞后项变量主要用以下4类指标,为了更加能够反映家庭收入对农村居民参保的影响,该文用过去3年的收入平均数来反映农村家庭持续性收入。具体包括以下4类家庭的持续性收入:农村家庭存量财富用农村家庭财产性收入($property_{it-n}$)表示;而农村家庭存量流量财富工资性纯收入($wage_{it-n}$)、经营纯收入($operating_{it-n}$)和转移性纯收入($transfer_{it-n}$)。之所以要划分成这4类收入,主要考虑财产性收入是属于农村家庭的存量财富,而取农村家庭这4类不同性质的持续性收入主要是为了辨识对参加“城居保”的意愿和投保档次,以此辨别哪一类收入对“城居保”的影响程度。

2.2.2 其他控制变量

在上述模型中,引入了相关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户籍制度(T)、农村家庭的存款余额(\ln

(save)_{it})、人口结构 (popstructure_{it})、老年人口抚养比 (elderly_{it})、性别比 (sex_{it})、农业人口 (agricultural_{it})、幼儿入园情况 (kgarten_{it})、人口自然增长率 (growth_{it})、农村居民教育程度 (hschool_{it})、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_{it})。相关变量符合及含义具体见表1。

表1 相关变量符号及含义

“城居保”	ln (insurance) _{it}	取各省“城居保”每年支出的对数
生活消费支出	consumer _{it}	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占农村人均总支出的比值
食品等日常性支出	expenditure _{it}	农村人均食品、烟酒、衣着和居住类消费支出占农村人均总支出的比值
文体消费支出	stylistic _{it}	农村人均文体消费支出占农村人均总支出的比值
医疗消费支出	medical _{it}	农村人均医疗消费支出占农村人均总支出的比值
财产性收入	property _{it-\bar{n}}	农村家庭过去3年人均财产性平均纯收入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
工资性纯收入	wage _{it-\bar{n}}	农村居民家庭过去3年人均工资性平均纯收入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
经营纯收入	operating _{it-\bar{n}}	农村居民家庭过去3年人均家庭经营平均纯收入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
转移性纯收入	transfer _{it-\bar{n}}	农村居民家庭过去3年人均转移性平均纯收入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
户籍制度	T	2013年之前取值为0, 2013年之后取值为1
农村家庭的存款余额	ln (save) _{it}	取农村家庭的存款余额的对数
人口结构	popstructure _{it}	农村15岁以下60岁以上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值
老年人口抚养比	elderly _{it}	老年人口抚养比
性别比	sex _{it}	根据户籍所在地农村人口性别比 (女性=1)
农业人口	agricultural _{it}	根据户籍所在地农业人口比值
幼儿入园情况	kgarten _{it}	农村幼儿园入园人数占乡村总人口的比值
人口自然增长率	growth _{it}	人口自然增长率
农村居民教育程度	hschool _{it}	农村高中学历人数占乡村总人口的比值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_{it}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地方GDP的比值

2.2.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该文构建了2010—2016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由于西藏数据不全而没有纳入样本范围。其中,“城居保”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生活消费支出、文体消费支出、医疗消费支出、财产性收入、工资性纯收入、经营纯收入和转移性纯收入等相关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人口结构、农业人口、幼儿园入园情况、户籍人口性别比、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表2报告了上述变量统计性描述。

表2 相关变量统计性特征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 (insurance) _{it}	3.057 8	1.223 2	-1.108 7	5.363 7	ln (save) _{it}	4.015 2	2.368	-0.962 0	6.328 0
consumer _{it}	0.644 0	0.149 8	0.272 1	1.062 1	popstructure _{it}	0.121 5	0.060 0	0.028 3	0.291 7
expenditure _{it}	0.444 7	0.109 2	0.169 5	0.731 3	elderly _{it}	0.127 5	0.025 2	0.074 0	0.200 0
stylistic _{it}	0.055 6	0.020 2	0.019 3	0.139 9	sex _{it}	1.051 0	0.030 6	0.985 9	1.118 5
medical _{it}	0.056 3	0.015 8	0.025 4	0.124 5	agricultural _{it}	0.603 6	0.166 4	0.095 4	0.838 6
property _{it-\bar{n}}	0.500 0	0.501 4	0.000 0	1.000 0	kgarten _{it}	0.009 5	0.004 6	0.000 4	0.020 7
wage _{it-\bar{n}}	0.041 7	0.030 8	0.007 4	0.164 4	growth _{it}	0.005 2	0.002 6	-0.000 6	0.011 5
operating _{it-\bar{n}}	0.281 9	0.024 0	0.233 4	0.355 2	hschool _{it}	0.152 0	0.037 0	0.069 7	0.252 0
transfer _{it-\bar{n}}	0.450 9	0.143 8	0.119 8	0.756 4	investment _{it}	0.019 8	0.010 3	0.000 1	0.042 8
T	0.385 9	0.183 6	0.028 0	0.786 2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模型回归

为了验证不同性质收入对“城居保”支出的影响，主要考察了农村家庭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根据表3的实证结果发现，财产性收入对“城居保”支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财产性收入变化1单位，“城居保”支出分别变化2.172，并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工资性收入对“城居保”支出影响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经营性收入对“城居保”支出影响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而转移性收入对“城居保”支出影响不显著。可以看出，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不同性质的收入对“城居保”支出具有显著不同的影响，其中，财产性收入作为存量财富，对“城居保”支出的最为显著，接受原假设(1)。而作为流量财富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城居保”支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可能的解释是：农村家庭中存量财富越高，家庭生活越稳定，会增加对养老保险的支出，从而说明存量财富的重要性，即存量财富占比越高，家庭所能够承受风险越强，导致农村家庭参加投保的积极性也高；而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作为农村家庭的流量财富，工资性收入主要用于家庭中的教育、医疗和生活消费支出，经营性收入主要用于再投资或消费，正是对这类收入具有支出“刚性”引致的不确定性^[14]，为了晚年能够“老有所养”，更倾向于参加投保以保证晚年生活的稳定性。

表3 不同性质的收入来源对城居保影响的估计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 $\ln(\text{insurance})_{it}$			
$\ln(\text{insurance})_{it-1}$	0.504*** (6.84)	0.522*** (7.70)	0.468*** (6.15)	0.438*** (5.64)
property_{it-n}	2.172*** (2.42)			
wage_{it-n}		-0.504* (-1.85)		
operating_{it-n}			0.350** (2.34)	
transfer_{it-n}				0.159 (-0.23)
elderly_{it}	8.313*** (2.95)	7.981** (2.15)	7.859* (1.95)	8.257** (2.35)
investment_{it}	-10.838* (-1.76)	-12.487 (-0.71)	-11.40** (-2.13)	-13.645** (-2.21)
sex_{it}	2.688*** (2.83)	7.314 (1.40)	12.963 (1.45)	16.122*** (3.67)
agricultural_{it}	0.608 (0.35)	-0.820 (-0.52)	0.618 (0.43)	-0.477 (-0.43)
常数项	-2.019*** (-2.34)	-5.674*** (-3.09)	-12.08*** (-2.40)	-15.033*** (-3.68)
控制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180	180	180	180
拟合值	0.567	0.431	0.670	0.632
AR (1) / AR (2)	0.021/0.691	0.043/0.551	0.003/0.776	0.064/0.690

注：***、**、* 分别代表系数在1%、5%、10%水平上显著；AR (1) / AR (2) 表示一阶序列相关值/二阶序列相关值，下同

根据上述的实证结果，作为存量财富的财产性收入是影响农村家庭是主要因素。这一结果是在不考虑体制自身影响外采用了非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同时对于财产性收入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模型中还选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支出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估计。

从表4中可以发现：在第一列中没有考虑变量内生性，并采用OLS回归分析，而在第二至四列中考虑了财产性收入指标的内生性问题，选择“新农合”支出作为工具变量，因为“新农合”也是以农村居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其方式与“城居保”相配套的惠民政策，并选择系统-GMM方法进行回归估计。从第一列的DWH统计量看，模型中的确存在内生性。研究发现，无论是否考虑体制本身影响，结果显示财产性收入对其影响较为稳定，并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拥有的财产性收入非常重要，这种以存量为主要形式的财富要比流量形式存在的财富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即财产性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会增加养老保险支出依赖，以选

择参保从而能够保障更加稳定的晚年生活水平不受影响。

3.2 “城居保”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分析

表5列出了“城居保”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情况，实证结果显示“城居保”对农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食品性等日常性消费支出、文体消费支出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并在5%以上水平显著。具体而

表4 财产性收入对“城居保”的估计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 $\ln(\text{insurance})_{it}$			
$\ln(\text{insurance})_{it-1}$		0.539*** (7.09)	0.506*** (8.57)	0.505*** (7.20)
property _{it-1}	3.402*** (4.78)	3.292** (4.12)	2.972*** (2.05)	2.994*** (3.47)
elderly _{it}	5.862* (1.89)		6.879* (1.81)	7.047** (2.02)
investment _{it}	-8.421*** (-2.41)			-10.566* (-1.59)
sex _{it}	5.642* (1.76)			4.815 (1.31)
agricultural _{it}	0.121 (0.16)			0.107 (0.11)
常数项	2.336*** (7.70)	1.151** (1.98)	-3.408 (-1.03)	-3.021 (-0.90)
控制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210	180	180	180
拟合值	0.745			
杜宾-吴-豪斯曼检验	0.047	0.953	0.869	0.961
AR (1) / AR (2)		0.000/0.369	0.000/0.548	0.000/0.524

注：***、**、* 分别代表系数在1%、5%、10%水平上显著

表5 “城居保”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能力的估计

变量名称	consumer _{it}	expenditure _{it}		stylistic _{it}		medical _{it}		
因变量滞后3期	0.974*** (10.87)	0.838*** (7.68)	1.042*** (15.93)	0.867*** (7.79)	0.673*** (8.67)	0.780*** (4.51)	0.420** (2.05)	0.381* (1.05)
$\ln(\text{insurance})_{it}$	0.031*** (3.75)	0.018** (2.01)	0.018** (3.15)	0.017* (1.73)	0.010*** (5.72)	0.009*** (2.67)	0.002* (1.85)	0.002 (1.21)
$\ln(\text{insurance})_{it} * T$	0.001 (0.40)	0.003 (0.98)	0.002 (0.65)	0.001 (0.32)	0.002** (2.39)	0.001* (1.61)	0.001* (1.87)	0.001 (0.93)
save _{it}	0.105*** (4.24)	0.236*** (3.87)	0.134*** (4.26)	0.325*** (3.52)	0.209*** (4.43)	0.238*** (3.82)	0.328*** (4.71)	0.268*** (3.78)
popstructure _{it}	0.364 (1.50)	0.216 (0.92)	0.378* (1.80)	0.241** (2.92)	0.078* (1.85)	0.149** (2.90)	0.023* (1.81)	0.040** (2.26)
agricultural _{it}		-0.631** (-2.16)		-0.240* (-1.76)		-0.013 (-0.26)		-0.022 (-0.41)
kgarten _{it}		9.777* (1.72)		8.488*** (2.64)		1.485 (1.09)		2.524* (1.70)
investment _{it}		-6.211* (-1.70)		-2.817* (-1.89)		-0.388* (-1.65)		-0.109* (-2.09)
hschool _{it}		-0.038 (-0.11)		-0.006 (-0.02)		0.098 (1.37)		-0.038 (-0.67)
growth _{it}		-2.788 (-0.22)		-3.185 (-0.31)		3.031 (0.98)		0.586 (0.07)
常数项	-0.075 (-1.14)	0.148 (0.69)	-0.077 (-2.32)	0.052 (0.49)	-0.015 (-2.15)	-0.040 (-1.19)	0.025*** (2.80)	0.033** (1.91)
控制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拟合值	0.657	0.642	0.761	0.658	0.790	0.703	0.731	0.774
AR (1) / AR (2)	0.023/0.863	0.012/0.474	0.092/0.454	0.011/0.693	0.008/0.547	0.028/0.483	0.023/0.538	0.041/0.317

注：***、**、* 分别代表系数在1%、5%、10%水平上显著

言,“城居保”支出变化1个单位,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变化0.018,对食品性等日常消费支出、文体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7和0.009,但对医疗消费支出不显著。因此,可以看出,“城居保”支出对农村家庭的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但改善方面主要体现在日常性消费支出方面,比如对医疗消费支出不显著,从深层次角度分析其实反映了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存在,农民仍然存在“大病不进城、小病不出门”的心理,归根到底还是农村家庭收入普遍偏低,特别是可持续性收入普遍偏低,“城居保”的惠民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居民“老有所养”的问题。

另外,户籍制度虚拟变量与“城居保”支出交乘项系数并不显著,反映了我国在推进“城居保”政策过程中,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水平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至少没有显著改善农村家庭的生活水平。虽然中国一直致力于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比如对城乡养老并轨的实施,中央也在大力推动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现状,成效也逐渐凸显,但仍然存在阻碍城乡一体化的制度性因素。比如农村与城镇居民的财产权不平等,尽管户籍制度上不在区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和城镇居民在养老和医疗方面的不平等问题,城乡居民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并不均等的现实仍然存在。

4 结论与讨论

该文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角度,通过选取合理的样本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回归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城居保”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水平和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农村家庭不同性质收入中,作为存量财富的财产性收入是主要影响农民参保的主要因素以及投保档次的制约因素,而“城居保”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水平和结构表现出异质性影响,“城居保”对农村居民总的生活消费支出、食品性等日常性支出、文体消费支出能力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医疗消费支出能力影响却不显著。

中央实施“城居保”主要目标是使“农民老有所养,无后顾之忧”,解决农村家庭的养老问题,同时希望能够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力度,改善农村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由于我国农村居民群体庞大,“城居保”的普惠政策也只是一个初级保底的养老制度,这就使得绝大多数参保居民人来说,面对“城居保”缴费数额低、保障力度有限的窘境,很难为我国农村家庭的养老问题提供根本性的保障作用。因此,国家要提供更多的支农、惠农财政补贴,进一步解决好农村养老资金缺口问题,另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宣传“城居保”的政策积极和辐射作用,让广大农村家庭能够真正了解这项政策的意图,取得老百姓的信任,让农村家庭选择更高档次的缴费额度,真正能够解决好农村老人“老有所养”的愿景。同时,要做好这项系统工程,一方面要加大城镇化建设,逐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性障碍,增加农村居民存量财富,同时提高流量财富,让更多农村家庭能够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相同养老待遇。

参考文献

- [1] 朱岩. 城市失地农民生存与发展问题研究——以浙江嘉兴市为调查样本.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3, 34 (2): 44-4.
- [2] 程令国, 张晔, 刘志彪. “新农保”改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模式吗?. 经济研究, 2013, 48 (8): 42-54.
- [3] Juarez L. Crowding out of private support to the elderly: Evidence from a demogrant in Mexico.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9, 93 (3-4): 454-463.
- [4] Fan E, Liu J T. Revisiting public income replacing private transfers: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with specification errors, Working Paper, 2012.
- [5] 宋建辉, 李瑾, 孙国兴. 天津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收入问题探讨.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4, 35 (3): 39-44.
- [6] 李晓华, 赵耀辉. 为什么年轻人工资上涨得这么快?——对1990年代中国城镇工资结构变动的解释. 劳动经济研究, 2015, 3 (4): 31-51.
- [7] 王旭光.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提升农民消费水平了吗——来自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南方经济, 2017, 23 (1): 1-12.
- [8] 贺立龙, 姜召花. 新农保的消费增进效应——基于CHARLS数据的分析. 人口与经济, 2015, 11 (1): 116-125.
- [9] 张晔, 程令国, 刘志彪. 新农保对农村居民养老质量的影响研究. 经济学(季刊), 2016, 15 (2): 817-844.
- [10] 岳爱, 杨鑫, 常芳.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日常费用支出的影响. 管理世界, 2013, 13 (8): 101-108.
- [11] 王桂新, 潘泽瀚, 陆燕秋.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中国人口

科学, 2012, 23 (5): 2-13, 111.

- [12] 程建, 程久苗, 费罗成, 等.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耕地社会保障价值研究——以安徽省怀宁县为例.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6, 37 (6): 158-163.
- [13] 石绍斌, 樊丽明, 王媛. 影响农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因素: 来自山东省入户调查的证据. 财贸经济, 2009, 23 (11): 42-48.
- [14] Jia W, Jian Z, et al.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and firm innovation, *Economic Modelling*, 2019, 8 (12): 226-239.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NEW RURAL ENDOWMENT INSURANC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Ao Baining¹, Zhang Fa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32,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intended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policy on 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status, and it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olicy and stabilize the rural consumer market. Based on the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life cycle theory, this research explored the impact of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policy on the level of 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by using the SYS-GMM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reasonable sample panel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perty wealth income was the main factor that affected peasants' participation and insured grade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policy among all kinds of income in rural households. The property wealth income based on stock wealth was more resistant to risks than the wealth in the form of flow. In other words, the property wealth income could increase the dependence of rural families on pension insurance to a large extent. In addition,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policy had a heterogeneous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capacity of rural households. Among them, daily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food and other daily expenditures, and cultural and sports expenditu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edical expenditure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of the new endowment insurance and make it radiate more outwards, so that the broad rural families can truly understand the intent of the policy. At the same tim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such as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should be removed so that more rural families can enjoy the same benefits as urban residents.

Keywords new rural endowment insurance; consumer spending capacity; rural families; property income; SYS-GMM